

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

——基于中国 27 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刘凤芹 卢玮静 张秀兰

摘要: 志愿行为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来源和当前中国重塑社会道德必不可少的力量,当前中国志愿服务主要参与者的特征是:中低收入、中共党员、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党政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本变量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有着清晰的跨越不同生命周期的志愿行为模式,年龄和志愿行为参与倾向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 U 型关系。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加强公众的文化资本,提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最终引导大众将遵守道德作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

关键词: 志愿行为; 文化资本; 微观数据; Tobit 模型

作者简介: 刘凤芹,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卢玮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DOI:10.13613/j.cnki.qhdz.002310

一、引言

志愿行为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来源和当前中国重塑社会道德必不可少的力量,同时志愿行为也有利于形成互助、信任的人际关系,推动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顺利转型。因此,对当前中国居民的志愿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志愿行为是一个包括很多内容的复杂现象,学界尚未有关于志愿行为的统一定义。Hustinx 等人(2010: 410-434)通过对 200 多个关于志愿行为的定义做内容分析发现,所有关于志愿行为的定义都围绕如下 4 个维度:(1)自愿性;(2)是否有报酬以及报酬的性质;(3)与受益对象的关系;(4)是否通过正式组织。每个维度的现实选择亦有相当跨度,如,自愿性可以是完全出于内心的自愿或者是迫于单位的要求和社会规范的压力。本研究将志愿行为界定为:个体非义务的、自愿性的无偿帮助其他个人、群体或机构的组织化行为。此处的组织可以是民间自下而上的组织,也可以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之所以强调组织行为旨在和日常偶发的、随性的非正式助人行为(比如:偶尔帮邻居买菜)区别开来。志愿行为与中国传统慈善并不等同,也与人民公社时期政治化色彩浓厚的“无私奉献”行为有质的区别。

国内关于志愿行为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践经验总结、政策环境分析等方面(谭建光 2005;谭建光和周宏峰 2008);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多针对某一特殊人群,如,对老年人志愿服务的研究(陈茗和林志婉 2003: 25-29)。相关大型调查主要有:2001 年丁元竹等人(2007)在全国六省市做的关于志愿服务的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有开创意义,但由于国内志愿行为发展迅速,对现有研究参考价值有限。2010 年张网成(2010)在全国六省市所作的“中国公民志愿服务调查”。

这次调查的结果值得借鉴,但对于志愿行为的解释还不够深入。国际上,关于发达国家居民志愿行为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轫,现今已经有颇为丰富的成果,Wilson(2012:176-212)对此作了很全面的综述,作者在此不再赘述。在这些研究中志愿行为的原因和内在驱动最为吸引学者的注意力,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国家间志愿行为的比较研究。

正如Anheier和Salamon(1999:43-65)所指出的:志愿行为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和原因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志愿行为主要是发源自民间的自组织行为,与其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志愿行为既包含自下而上发源自民间的自组织行为,也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行为。如社区志愿服务协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是当前中国志愿服务的两支重要力量,这两个组织都接受政府的领导和资源支持。

所以,由此而产生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前中国居民志愿行为的驱动因素和西方社会的有什么不同?比如,Wilson和Musick(1997:694-713)认为在美国志愿服务是一种由道德和社会规范引导的行为,文化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志愿行为构成比较复杂的社会中,文化资本在驱动志愿行为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利用2011年全国27个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调查问卷数据,考察文化资本对志愿行为的影响,并尝试给出合适的解释逻辑。研究文化资本对志愿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探讨志愿行为的社会根源,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无偿的贡献自己的时间。

二、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

(一)文化资本概念界定

文化资本由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布尔迪厄最初用文化资本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此处文化资本的原意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它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习惯和态度(李煜,2001:52-63)。自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众多学者用文化资本来解释从社会分层系统的维持到新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等众多社会现象。

虽然学术界对文化资本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达到共识,但对文化资本的内涵存有分歧,文化资本在不同研究中扮演不同角色,其内涵宽泛,缺乏精确定义。比如,Dimaggio和Useem(1978:141-161)将其操作化为知晓上层文化;Robinson和Garnier则将文化资本定义为教育文凭;Gouldner(1979)认为能够以一种文化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与人互动交流是一种文化资本;Dubin和Olshtain(1986)则将符合某特定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符号定义为文化资本;Lamont(2000:602-607)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制度化的、广泛分享的文化符号(比如态度、偏好、知识、行为、商品和文凭)这些文化符号的目的在于社会和文化的排斥。

Wilson等(1997:694-713)在其关于美国志愿行为的研究中,对文化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本质的扩展。Wilson认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主要论述了文化中“审美”的成分,这种观点过分看重认知,而忽略了文化中的道德成分(比如互信、公平、善良、责任感)。通过引入道德成分,Wilson将文化资本和更为传统的文化的表达方式“规则”(rule)联系起来。

国内对文化资本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包亚明编译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最早介绍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布尔迪厄,1997)。薛晓源和曹荣湘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较为系统地收录了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并对当前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趋向做了梳理(薛晓源和曹荣湘,2005)。国内有些学者也借助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如王立科研究发现人们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寡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王立科,2009:8)。综上,文化资本理论从原先关注社会阶层对教育成就影响的教育社会学及相关领域拓展延伸,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借用文化资本来解释社会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根源和不同文化带来的差异。

本文所用“文化资本”一词的含义与 Wilson 界定的大致相同(Wilson 和 Musick , 1997: 694 - 713) ,即 ,文化资本不仅是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 ,也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社会规则等。基于上文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和本研究所用数据的局限 ,本文选用教育、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是否为中共党员)、非正式助人行为这四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的文化资本。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制度化“教育文凭”这是一种狭义的测量。教育不仅给予我们知识 ,而且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化过程 ,教育告诉我们如何决定谁值得帮助、谁来提供帮助和如何提供 ,这其中蕴含着重要的慈善文化。由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行为宗旨和信仰追求 ,因此政治面貌这个变量在中国当下独特的环境中是个体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 ,它一方面反映了个体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也测量了中共党员这个群体的集体规范。宗教信仰测量了被访者的价值观念及信仰 ,一直是文化资本的重要成分。非正规助人行为反映了被访者的道德规范。

(二) 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之间的关系

志愿服务是一种由道德和社会规范引导的行为 ,因此需要文化资本(Wilson , 2012: 176 - 212) 。根据上文对文化资本的界定和测量 ,下面我们分别对教育、宗教信仰、非正式助人行为和政治面貌与志愿行为之间关系的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教育一直是传统文化资本测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是影响志愿行为的一个稳定而且强烈的变量(Smith , 1994: 243 - 263; Jackson 和 Bachmeier 等 , 1995: 59 - 78; Wilson 和 Musick , 1997: 694 - 713; Wilson , 2012: 176 - 212) 。 Bekkers 认为志愿行为在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公民中更为普遍(Bekkers , 2006: 349 - 366) 。 Van Ingen 和 Dekker(2011: 682 - 702) 利用荷兰的纵向跟踪数据表明 ,教育对志愿行为的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

宗教信仰也是影响志愿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Wilson 和 Musick(1997: 694 - 713) 利用美国数据发现“去教堂以及祈祷的频率”对被访者的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Wilson 指出宗教信仰对青年参加志愿服务的影响要比性别、身份、出生地等明显得多(Wilson , 2012: 176 - 212) 。 Ruiter 对 53 个国家进行跨国比较发现 ,频繁去教堂的人会更积极地参与志愿活动 ,同时在宗教氛围重的国家中信教人群和不信教人群志愿参与情况的差异要小于那些宗教氛围不浓厚的国家(Ruiter 和 De Graaf , 2006: 191 - 210) 。国内 ,王振耀(2012: 9) 研究了宗教在中国慈善事业转型中的作用 ,认为通过宗教信仰 ,人们养成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在中国 ,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所提倡的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等 ,客观上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普世价值。刘培峰论述了宗教和慈善的关系 ,认为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想渊源 ,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宗教对扶贫济困、社会救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 ,慈善也促进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刘培峰 2012: 44-46) 。

虽然政治面貌和志愿行为相关关系的研究比较少 ,但在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下 ,政治面貌是测量文化资本不可替代的一个变量。朱凯发现不论是参与意愿还是实际参与行动 ,党员的比例最高、团员次之、普通群众最低(朱凯 , 2005) 。

非正式助人行为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个体的道德规范 ,而道德规范对志愿行为有长期持久性的影响 ,它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变量起作用 ,也可以直接影响志愿者行为(Matsuba 和 Hart et al. , 2007: 889 - 907) 。

三、描述统计和计量模型结果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1 年 8 月至 12 月在中国 27 个城市、108 个社区问卷调查。数据的有效样本包含 5 352 户家庭 ,14 210 个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

层随机抽样。第一阶段是城市的抽取。综合考虑区域分布、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因素,在全国共抽取了27个城市。第二阶段是社区的抽取。分别在每个城市抽取四个社区,这四个社区分别是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数据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户面访。数据包含了丰富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公益行为和意愿、工作、健康等信息。

(二) 变量

本文所用的因变量为“志愿服务参与时间”变量,问卷相关问题有两个:第一个:“过去一年,您是否参加过由公益机构、工作单位、社区、政府以及宗教团体等发起的志愿服务”,第二个:“您去年参加志愿服务的总时长大约有多少小时”。文化资本包括教育、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是否中共党员)、非正式助人行为四个变量。问卷询问了被访者目前的最高学历,本研究将其分为三个类别:高中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如果被访者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或其他宗教)则编码为1,否则为0。政治面貌,被访者若为中共党员编码为1,否则为0。本研究的非正式助人行为用如下变量来测量:根据过去一年给陌生人提供非正式帮助(比如让座、指路)的频率,如果被访者回答“较多”或者“经常”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作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健康、社会支持、社区类型等变量。

(三) 描述统计

表1给出了本研究所用变量在2010年参与过志愿服务群体和2010年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群体这两个分组上的均值(或者百分比)和标准差,并对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37.2%的被访者在2010年参加过由公益机构、工作单位、社区、政府或者宗教团体等发起的志愿服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5.9岁,非志愿者的平均年龄为49.0岁。志愿服务组中已婚比例为84.3%,此比例显著高于非志愿者组。志愿服务组中14.2%有7岁至12岁小孩,而非志愿组中有7岁至12岁小孩的比例仅为12.5%。志愿服务组中8.9%的自评健康为较好,显著高于非志愿服务组的5.6%。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志愿服务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非志愿服务组没有显著差异。在工作状态方面,参加过志愿服务的群体中,10.9%的在党政机关工作,31.4%的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这两个比例均显著高于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志愿服务组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0.9%,而非志愿服务组中此比例仅为27.5%。

8.2%的参与过志愿服务的被访者有宗教信仰,而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的群体中,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仅为6.7%。在参与过志愿服务的被访者中,33%为中共党员,这表明中共党员是现阶段志愿服务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参与过志愿服务的群体中,53.6%的过去一年经常给陌生人提供非正式帮助,而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中,此比例仅为33.6%。

志愿服务组居民平均在社区居住的年限为13.1年,非志愿服务组仅为11.2年。志愿服务组中“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平均为2.8人,显著高于非志愿服务组。从描述统计来看,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在工作状态、教育、健康等方面均优于不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

(四) Tobit 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Tobit模型来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5352位被访者中,62.8%的被访者志愿服务时间为0。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仅仅利用了志愿服务时间大于0的样本(占总体的37.2%),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样本量,更重要的是丢失了重要的信息,因此会得到有偏的结果。由Tobin(1958:24-36)发展的Tobit模型利用了所有的观察值,其分析结果优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Tobit模型的系数不仅包含着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概率变化的信息,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那些参与志愿服务个体在具体志愿时间长短上的变化信息(McDonald, J. F. 和Moffitt, R. A., 1980:318-321)。当运行Tobit模型时,本文对因变量做了对数变换。

表 1 2010 年描述统计量

变量	志愿者 (<i>n</i> = 1 968)		非志愿者 (<i>n</i> = 3 319)	
	均值 (或百分比)	标准差	均值 (或百分比)	标准差
性别(女为 1,男为 0)	0.48	—	0.49	—
年龄***	45.9	12.5	49.0	15.5
婚姻***				
已婚	84.3	—	81.5	—
离婚	5.4	—	5.7	—
丧偶	3.5	—	6.5	—
未婚或其他	6.8	—	6.3	—
家中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12.1	—	12.9	—
家中有 7—12 岁孩子	14.2	—	12.5	—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 926.4	19 996.4	17 333.4	23 281.2
教育***				
高中以下	26.2	—	42.0	—
高中	32.9	—	30.5	—
大专及以上	40.9	—	27.5	—
健康***				
较差	56.3	—	57.1	—
一般	34.8	—	37.5	—
较好	8.9	—	5.4	—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2.8	2.5	2.5	1.9
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	13.1	12.3	11.2	11.7
有宗教信仰***	8.2	—	6.7	—
为中共党员***	33.0	—	20.5	—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给陌生人提供过非正式帮助	53.6	—	33.6	—
你会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	62.1	—	45.0	—
工作状态***				
在党政机关工作	10.9	—	3.4	—
在国有集体企事业、社会团体工作	31.4	—	20.4	—
在私营企业或者个体经营	25.8	—	24.6	—
在校学生	0.5	—	0.7	—
离退休	20.7	—	33.7	—
失业下岗	5.7	—	5.9	—
因家庭成员需要照顾而不工作	1.9	—	4.6	—
因生病残疾而不工作	1.8	—	3.9	—
不需要工作或其他	1.3	—	2.8	—
所在城市出台了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	70.5	—	65.6	—
社区类型(老旧小区为参照类别)***				
老旧小区	25.7	—	25.1	—
商品房社区	24.1	—	25.7	—
单位大院	28.6	—	23.3	—
保障房社区	21.6	—	25.9	—
居住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个)	4.1	—	3.9	—

注:(1) * <0.1, ** <0.05, *** <0.01。

四、实证结果

表2给出了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教育、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本变量均对志愿服务行为有显著影响,此外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收入等变量对志愿服务参与也有显著影响。

(一) 文化资本变量

Tobit模型结果显示:教育、宗教信仰、政治面貌、非正式助人行为这四个文化资本变量都对志愿服务行为有显著影响。

教育作为一种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对个体志愿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Tobit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比仅有高中以下教育水平个体的志愿贡献多20.2%,而高中毕业的群体比仅有高中以下教育水平个体的志愿贡献多7.5%。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志愿行为,本研究认为有三种路径可以解释:(1)教育传播了本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如,助人为乐、学习雷锋好榜样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词语。因此,学校教育通过对基本道德律的教化,间接地培育了慈善文化。(2)教育高的公民往往有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一个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有较高的认同。(3)志愿行为是一项规范的有组织的助人行为,需要一定的资本。如,法律等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的能力,而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比起教育低的公民显然更可能拥有这些资本。

宗教信仰承载着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价值追求和伦理道德;它为个人生活提供意义,也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金泽,2013:110—119)。模型结果显示,有宗教信仰的群体比没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志愿服务贡献多26.5%。在西方社会,宗教信仰是慈善价值理念的一个重要来源。西方关于宗教信仰和志愿行为的经验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会提高个体的利他性,鼓励人们去更多地为他人福利着想(Greeley,1997:587—594)。在中国,儒、释、道与民间信仰一起构成了中国宗教的基本谱系,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在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中亦得到相对吸纳。这些宗教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卓新平,2011:28—29)。在中国快速变迁的经济环境下,“善”是中国传统价值中对命运、缘分和报应等信仰的核心存在,是中国道德资本的部分(范丽珠,2007:45—52)。以善为核心的这种传统伦理道德虽几经波折,但始终根植在中国人的精神精髓中,成为当下中国志愿行为的社会根源之一。除了通过价值引导志愿行为产生影响外,中国宗教团体亦通过组织各类基金会直接引导信众参与公益,比如北京市的仁爱慈善基金会。

Tobit模型结果还显示,比起非党员,中共党员每年要多贡献26.8%的志愿服务。为什么中共党员比起非党员会贡献更多的志愿服务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首先,中国现阶段的志愿行为是一种嵌套在强有力的政府控制之下的行为,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仍然是其重要的手段。在现行体制下,中共党员自然是首选的动员对象。如2013年某城市要求所有公务员必须参与某种社区服务。其次,志愿行为不仅仅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物品,同时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体现志愿者是一个“好人”的方式。志愿行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符合中共党员的身份要求。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和功用,而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个体的象征意义。志愿行为象征着为其他人的福利着想,这与中共党员这个群体的集体规范不谋而合。比如:在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时候,党政机关、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总是会发出党员需要积极行动的号召。

表 2 Tobit 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边际效应
性别(男性为参照类别)	0.011	0.104	0.005
年龄***	0.138	0.026	0.055
年龄的平方***	-0.002	0.000	-0.001
婚姻(已婚为参照类别)			
离婚	0.140	0.220	0.056
丧偶	-0.713	0.241	-0.287
未婚或其他***	0.478	0.240	0.192
家中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0.241	0.168	-0.097
家中有 7—12 岁孩子	-0.131	0.150	-0.053
收入(最低 20% 为参照类别) ***			
次低 20%	-0.119	0.152	-0.048
中间 20%	-0.370	0.158	-0.149
次高 20%	-0.372	0.166	-0.150
最高 20%	-0.654	0.171	-0.263
健康(较好为参照类别)			
一般***	0.407	0.111	0.164
较差	0.016	0.217	0.007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0.072	0.023	0.029
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 ***	0.025	0.005	0.010
教育** (高中以下为参照类别)			
高中	0.187	0.127	0.075
大专及以上学历	0.502	0.147	0.202
有宗教信仰***	0.658	0.178	0.265
为中共党员***	0.667	0.120	0.268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给陌生人提供过非正式帮助***	0.829	0.109	0.334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给乞讨者提供过非正式帮助***	0.141	0.133	0.057
你会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	0.904	0.099	0.363
工作状态(在党政机关工作为参照类别)			
在国有集体企事业、社会团体工作	-0.574	0.192	-0.231
在私营企业或者个体经营***	-1.053	0.204	-0.423
在校学生***	-0.507	0.667	-0.204
离退休***	-1.174	0.248	-0.472
失业下岗***	-1.133	0.283	-0.456
因家庭成员需要照顾而不工作***	-2.078	0.357	-0.836
因生病残疾而不工作**	-1.174	0.395	-0.472
不需要工作或其他	-2.222	0.426	-0.894
所在城市出台了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	0.267	0.107	0.107
社区类型(老旧社区为参照类别)			
商品房社区	-0.234	0.141	-0.094
单位大院	0.142	0.140	0.057
保障房社区	0.053	0.145	0.021
居住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个) **	0.038	0.017	0.015

注: (1) * < 0.1, ** < 0.05, *** < 0.01; (2) 年龄平方的标准误差为 0.000 25。

在本研究中, 我们用“过去一年是否经常给陌生人提供帮助”(比如让座、指路) 来测量非正式助

人行为。模型结果显示,过去一年经常给陌生人提供让座、指路等非正式帮助的被访者比起其他人平均每人每年多贡献 33.4%。虽然和志愿行为通过正式组织实现不同,非正式助人行为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发性,但是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为不存在义务关系的陌生人提供服务。所以,可以推测,这两种行为背后的价值驱动一致,即一种愿意为陌生人提供无偿帮助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建立陌生人信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西方文献中关于非正式帮助的定义和本研究不同,他们通常将对朋友、亲戚等具有一定义务关系的人的帮助也定义为非正式帮助。对于此类非正式帮助行为,西方的文献研究发现:底层社会的群体更喜欢非正式的互助行为,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互惠的社会规范,用以应对各类社会问题,而中上层社会的群体则更倾向于正式的志愿服务。利用本次调查数据和卡方检验发现:在中国社会非正式助人行为和收入无关,但和教育水平显著相关。

(二) 控制变量

Tobit 模型结果表明:除了文化资本变量外,年龄、收入、工作单位、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等变量也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有着清晰的跨越不同生命周期的志愿行为模式:年龄和志愿行为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 U 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志愿服务贡献增加,然后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志愿服务会逐渐减少。此发现和美国的研究发现大致相同。在美国,从青少年转入成年初期的时候,志愿服务的参与率会降低;随着生命周期进入中年,参与率会提升;到了老年则又会下降(Wilson, 2000: 215-240)。在当下中国,根据生命周期理论,60 后、70 后是参与志愿服务的主体,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成人角色:有稳定的工作、正在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对人间疾苦有一定的切身体验;同时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对志愿服务参与都有正向的影响。整体而言,年龄对志愿行为的影响是间接的、非线性的,通常是生命周期、健康以及同期群(cohort)效应的综合反映。

考虑到各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同时中国尚没有合适的城市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调整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在各个城市内部依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五等分的办法来测量被访者的收入。模型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最低 20% 的被访者的志愿服务贡献和次低 20% 以及中等 20% 的被访者的志愿服务贡献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显著高过最高 20% 和次高 20%。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此研究发现和美国的有关研究结果不一致。Lee 和 Brudney(2009: 512-530) 研究发现,收入对美国公民志愿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家庭收入处于中等收入(50 000 美元至 74 999 美元之间)的被访者对志愿服务的贡献要显著高过其他群体。为什么在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志愿服务是由低收入群体贡献的呢?机会成本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因此,高收入者更倾向于捐钱这种公益行为。利用本次调查数据来运行关于收入对捐款影响的模型表明,收入和捐款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处在最高 20% 和次高 20% 的被访者的捐款额度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为什么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笔者在福州对低收入志愿者进行访谈时,其中一个被访者认为:穷人能够真正了解穷人所遭受的疾苦,所以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多帮助别人一些。此外,进一步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低收入者群体中,存在着少量忠诚度非常高的志愿者,即,这些人的志愿服务时间非常长(最长者为 3 000 小时)。正是这些忠诚度较高的志愿者拉高了低收入群体整体的志愿服务贡献。

工作单位对志愿服务也有着显著影响。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被访者对志愿服务的贡献显著高于在私营企业工作的被访者。这表明,现阶段,中国城镇志愿服务的动员方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动员,这种动员方式下的志愿行为由于缺乏真正的群众热情,所以往往流于形式,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都差强人意。

“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的人数”这一变量测量了被访者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模型结果显示此

变量和志愿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西方的研究文献发现社会资本与志愿行为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关系: 在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 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因为志愿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资本, 反之, 一个社会网络广泛的个体也更容易获得志愿服务的机会。此外, 在社区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利个体参与志愿行为, 这也验证了已有发现: 对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是激发志愿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利用调查数据探讨文化资本对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志愿行为的影响。在此目的之下, 作者采用 Tobit 模型对 27 个城市的志愿行为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 教育、宗教信仰、中共党员和非正式助人行为等文化资本变量均对个体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计量结果还显示当下中国城市的志愿服务提供者主要特征是中低收入、受过一定的教育、中共党员、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这和 Smith 根据美国经验数据提出的主流阶层模型并不一致, 在美国, 白人、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志愿服务提供的主要群体 (Smith, D. H., 1994: 243 - 263)。这说明, 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对现阶段的志愿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 Anheier 和 Salamon (1999: 43 - 65) 所阐述的: 志愿行为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中国的志愿行为是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严重缺失这样的背景下, 从邻里互助、积善余庆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催生出来。依附于民政部门的社区服务志愿组织和由团中央发起, 并领导成立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是中国现阶段志愿服务提供两大重要力量。交织于社区志愿组织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两大官方志愿组织中间的, 是各种真正从民间自发产生, 并且依靠自主力量成长的志愿组织, 这些组织由于体制、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存格局。因此, 在当前中国, 文化资本对志愿行为的影响路径和背后的社会机制与西方国家是显著不同的, 如中共党员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的实证结果也表明, 志愿服务提供者的特征呈现出一种混合的图景, 如低收入者的志愿服务贡献要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

值得指出的是, 西方的志愿行为和宗教信仰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但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社会中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本文的调查数据也验证了这个事实, 本次调查发现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人数是有宗教信仰人数的 11.5 倍。针对这一事实, 杨庆堃 (2007)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概念, 认为虽然在中国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下, 缺乏一个结构显著的、组织化的宗教, 但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却充溢于中国社会生活。弥漫性宗教信仰是一种基层支持力量, 对于世俗制度和整体的社会秩序起着重要作用。如, 民间的“关公崇拜”, 实际上就是崇拜忠义和遵守诚信。现代信息化社会, 各种传播工具的兴起, 使得一个事件的传播速度和受影响人数都是以几何级数来进行的, 因此宗教信仰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人身上。中国五大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因素, 对于今天营造“施与文化”氛围、培育慈善价值理念、推进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的开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 工作单位类型以及政治面貌等变量的强烈显著性, 也验证了现阶段行政化动员仍然是中国城镇的志愿服务参与的主导方式。其内在原因是在现阶段, 人们对政府、单位和所在社区的信任远远超过社会公益组织。在本次调查中, 当询问被访者“您愿意通过何种途径参加志愿服务”时, 43.6% 的被访者将“所在单位或者党组织发起”作为首选途径; 40% 的被访者将“所居住社区发起”作为首先途径; 只有 4.9% 的人将“社会公益组织发起”作为首选。因此, 发展政府帮助下的社区自治组织是发展志愿服务合适的途径之一。

中国正处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靠“人情”彼此帮助, 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人际间的一般性信任, 如何彼此帮助, 这些都需要教化

和培育。Putnam, R. D. (2000) 表明志愿行为和人际间的一般性信任有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 志愿行为能够促进信任的建设, 而一般性信任的提升也能催生更多志愿行为。因此, 政府和社会应该创新志愿行为参与机制, 如从学校入手, 培育青少年从点滴做起, “勿以善小而不为”, 通过教育加强公民参与志愿行为的文化资本, 利用志愿服务这个载体来弘扬中国传统美德, 引导大众将遵守道德作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

本研究在分析文化资本对志愿行为影响时, 尚有如下遗憾: (1) 由于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具体操作阶段的行为要求, 一般会要求领取救助金的人员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虽然这种行为是否是志愿行为有待商榷, 但在做问卷调查时被访者通常将其算作了志愿行为。将这部分样本去掉, 重新拟合 Tobit 模型, 仍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2) 由于本次调查的时间是 2011 年的 9 月份—10 月份, 绝大部分大学生都在大学校园里面。因此, 本次调查对象不包括大学生这个群体。这是一个遗憾, 因为大学生通过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个平台是中国现阶段志愿服务的重要贡献群体。

参考文献:

- [1] 布尔迪厄, 1997, 《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 包亚明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 陈茗、林志婉, 2003, 《老年志愿者活动的理论思考和实证分析》, 《人口学刊》第 4 期, 第 25—29 页。
- [3] 丁元竹、江汛清等, 2007,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范丽珠, 2007, 《“善”作为中国的宗教伦理》, 《甘肃理论学刊》第 6 期, 第 45—52 页。
- [5] 金泽, 2013, 《立足中国宗教国情,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世界宗教文化》第 6 期, 第 110—119 页。
- [6] 李煜, 2001, 《文化资本, 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第 52—63 页。
- [7] 刘培峰, 2012, 《宗教与慈善——从同一个站台出发的列车或走向同一站点的不同交通工具》, 《世界宗教文化》第 1 期, 第 44—46 页。
- [8] 王立科, 2009, 《论文化资本及其对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 《中国高教研究》第 2 期, 第 8 页。
- [9] 王振耀, 2012, 《宗教与中国现代慈善转型——兼论慈悲, 宽容, 专业奉献及养成教育的价值》, 《世界宗教文化》第 1 期, 第 9 页。
- [10] 薛晓源、曹荣湘, 2005,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1] 谭建光, 2005, 《中国广东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2] 谭建光、周宏峰, 2008, 《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中国志愿服务的“广东经验”》,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13] 杨庆堃, 2007,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4] 张网成, 2011, 《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2011): 现状、特点及政策启示》,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15] 朱凯, 2005, 《大学生眼中的“志愿服务”——对北京市两百余名大学生看待“志愿服务”的调查》,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S1)》。
- [16] 卓新平, 2011, 《从“文化强国”战略看中国传统文化及宗教的意义》, 《中国宗教》第 12 期, 第 28—29 页。
- [17] Anheier, H. K. and L. M. Salamon, 1999, Volunteer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itial Comparison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2 (4), pp. 43–65.
- [18] Bekkers, R., 2006, Traditional and Health-related Philanthropy: The Role of Resources and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9 (4), pp. 349–366.
- [19] Dimaggio, P. and M. Useem, 1978, Social Class and Arts Consumption, *Theory and Society*, 5 (2), pp. 141–161.
- [20] Dubin, F. and E. Olshtain, 1986, *Course Desig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1] Gouldner, A. W.,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A Frame of Reference, Thesis, Conjectures, Arguments, an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igent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Contest of the Modern Era, Macmillan.
- [22] Greeley, A., 1997, Coleman Revisited Religious Structures as a Source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5), pp. 587–594.
- [23] Hustinx, L. and R. A. Cnaan, et al., 2010, Navigating Theories of Volunteering: A Hybrid Map for a Complex Phe-

- nomenon ,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 40 (4) , pp. 410 – 434.
- [24] Jackson , E. F. and M. D. Bachmeier , et al. , 1995 ,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Do religious and Associational Ties Promote Helping Behavior?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 24 (1) , pp. 59 – 78.
- [25] Lamont , M. , 2000 , Meaning-making in Cultural Sociology: Broadening Our Agenda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 29 (4) , pp. 602 – 607.
- [26] Lee , Y. and J. L. Brudney , 2009 , Rational Volunteering: A Benefit-cost Approach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 29 (9/10) , pp. 512 – 530.
- [27] Matsuba , M. K. and D. Hart , et al. , 2007 ,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structural Influences on Commitment to Volunteering ,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 41 (4) , pp. 889 – 907.
- [28] McDonald , J. F. and Moffitt , R. A. , 1980 , The Uses of Tobit Analysi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62 (2) , pp. 318 – 321.
- [29] Putnam , R. D. , 2000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Simon and Schuster*.
- [30] Robinson , R. V. and M. A. Garnier , 1985 ,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Men and Women in France: Reproduction Theory on Its Home Ground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pp. 250 – 280.
- [31] Ruiter , S. and N. D. De Graaf , 2006 , National Context , Religiosity , and Volunteering: Results from 53 countr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71 (2) , pp. 191 – 210.
- [32] Smith , D. H. , 1994 ,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and Volunteering: A Literature Review ,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 23 (3) , pp. 243 – 263.
- [33] Tobin , James , 1958 ,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 *Econometrica* , 26 , Jan. , pp. 24 – 36.
- [34] Van Ingen , E. and P. Dekker , 2011 ,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and Time Investment Between 1975 and 2005 in the Netherlands ,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 40 (4) , pp. 682 – 702.
- [35] Wilson , J. and M. Musick , 1997 ,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pp. 694 – 713.
- [36] Wilson , Johu , 2000 , Volunteering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26 (1) , pp. 215 – 240.
- [37] Wilson , J. , 2012 , Volunteerism Research a Review Essay ,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 41 (2) , pp. 176 – 212.

(责任编辑: 匡 云)

ABSTRACTS

Combination of Freedom and Tradition——Rereading *Chinese Anthology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u Dong

Thorough careful review of historical memory , I went back to the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 and therefore explained its fleeting , short and precious moments , with both reasons of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rsonal efforts; then mainly around the text of *Chinese Anthology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 I showed the great figurines of so many important scholars in such campus , and based on their target to combine freedom and tradition , Chinese and science , and National scholarship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 I did resolve so-called *Qian Xuesen Puzzle* which has long plagued academic circ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Expropriating Theory off Literary Field

Zhang Jiang , Wang Ning , Zhou Xian and Zhu Liyu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 various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have flooded into China exerting strong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terary theory. But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 have not so far recognized this due to their own limitation and weakness. From 2012 onward , Professor Zhang Jiang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y. To him , its fundamental defect lies in the so-called " mandatory interpretation "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xpropriating theory off literary field to construct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We here just publish the essays by Zhang Jiang , Zhu Liyuan , Wang Ning and Zhou Xian focusing on the expropriation of theory off literary field in the hope of pushing forward the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The Volunteering Behavior of Urban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apital: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27 Cities in China

Liu Fengqin , Lu Weijing , Zhang Xiul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eer behavior and cultural capital using data from the 2011 Chinese urban resident philanthropy behavior survey. Tobit model is us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censored data. Findings show that cultural capital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volunteer behavior.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urban volunteers are low- and middle-income ,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 educated and working at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the propensity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 is implicated: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ir propensity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by means of flourishing Chinese fine culture , guiding people to live a life which values morality.

State Corporatism: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Wang Xinsong

The management of grassroo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has shown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 corporatism. A peak association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exists at the state level and is given legitimacy and funding support by the state. The peak association manages its members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so that state policies are able to be implemented in communities with the help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Meanwhile , community needs are conveyed through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to the state. State corporatism both allows for participation by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and controls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 ensuring a stabl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However , state